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六九期 ——
(二〇一〇年十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10a)

【当事者言】	冲击钓鱼台事件中的陈伯达	王保春 王文耀
【不堪回首】	我所经历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	许人俊
【史海钩沉】	1966年封闭《红卫报》(原《羊城晚报》)事件	叶曙明
【荒唐年代】	文革中的学毛选闹剧	任予怀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二十一)	舒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当事者言】

冲击钓鱼台事件中的陈伯达

• 王保春 • 王文耀 •

1966年底到1968年初，全国大乱，许多干部被打倒。而中央文革的成员也像剥笋似地倒台。随之有一点牵连的工作人员也都不被信任，关的关，赶走的赶走，又换些新人，工作上互不衔接。陈伯达也早已摇摇欲坠成了个傀儡，一切都由江青说了算。江青脑子膨胀，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如证明是错的，她是从来不承认的，而且全盘推给别人。

一、被牵涉进钓鱼台事件

1968年3月3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总理向大家说，原来收藏在鲁迅博物馆里的鲁迅手稿不见了，主席让我们迅速查找。会后周总理、陈伯达、江青还一起坐车去景山前街许广平家看望安慰她。之后，总理和陈伯达商量，将这个任务交给杨成武。陈伯达到家之后，马上让王保春打电话给杨成武，迅速查清鲁迅手稿的下落。杨成武接到这个任务感到茫然，不知从哪儿入手。陈伯达对此事也非常着急，当夜便和杨成武及新上任不久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肖力，去找已被免职赶回原单位的前办事组长王广宇查问。王对此事一概不知。但他

是可疑人之一，随之将其送进了监狱。

最后总理给杨成武出了个主意，叫卫戍区傅崇碧去查，说你们可以去提审一下戚本禹，他应该知道些情况。

根据总理的建议，杨成武、傅崇碧连夜去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戚说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知道此事。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倒台后，韩书信等一批工作人员已不被信任，都被赶回原单位了。此时韩书信正巧借机回四川探亲。而傅崇碧让韩连夜乘飞机回京，说有急事找他。韩到京后有人去接，让他住在一个地方，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不准与任何人接近。当韩书信一听说此事，便说何先伦知道。何也离开了中央文革。傅崇碧又设法找到了何先伦，何又说承办人是现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员卜信荣，他知道。

傅崇碧经过几天几夜的追查，转来转去，知情人都在钓鱼台的中央文革里面。

傅崇碧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让报告江青。是办事组组长肖力接的电话，傅崇碧问肖力：“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个人吗？”肖力说“有。”傅说：“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向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马上就到。”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驱车前往钓鱼台。

傅崇碧是卫戍区司令员，他曾多次出入钓鱼台，警卫人员是他的部下，这很正常。可是这时，王保春接到文革办事组长肖力的电话说：“傅崇碧要进来，请报告组长！（即指陈伯达）”王说：“伯达同志不在，他出去了……”对方不等把话说完便立刻挂了电话。同样急切的语言，接连打来几次。王保春感到异常，以为让他通知门卫，便立即给东门警卫去电话，请傅司令进来。实际他们已经进去了。

事后知道，当时傅司令走到中央文革办公的十六楼前，见到姚文元在散步。姚向傅礼节性地打了招呼后，便一起走进了楼里的会议室。还未站定，江青就推门进来了，见室内站立了四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吗？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进来的？”这时傅崇碧的秘书，由于经过几天日夜紧张地劳累，加之身体本来就有病，看到这种场面，过于紧张，当场晕倒在地上。当时江青还让人将他扶起，给水喝。

傅崇碧向江青讲了他的来意，并说是经过批准进来的。

据说傅崇碧走后，江青让人从保密室抬出几箱子鲁迅手稿，打开边翻看，边自语道：“嗯，这样重要的手稿，如给弄丢了，那简直是犯罪哟！”可是，事后她在追查谁批准傅崇碧进钓鱼台时，却说傅带的人腰里别着枪对着她。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傅崇碧武装冲击钓鱼台的谎言。

二、陈伯达说：让你写你就重写吧

1968年3月7日下午，陈伯达心情烦闷，要去西山散步，不知怎么刘叔晏也随陈去了。这样，陈、刘、王文耀一起，坐车出钓鱼台北门向西，直开香山脚下。

陈伯达常去香山，其原因除解放初期他随党中央驻在香山，去香山有旧地重游的意味以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1936年陈伯达保释出狱后住在香山养病，病养好了要出院时，没钱支付出院费。出不了院，医院里的大夫对他也无可奈何，只好说：你先出院吧，等你以后发达了再报答我吧。所以，陈心里一直感到内疚，想找到那个大夫或者他的家人。

这一次是因为有人对他那次出狱有所怀疑，陈一时说不清楚，其心情痛苦难言。陈四处寻

找他养病时的民房，并向我们讲述他在国民党的草岚子监狱中生病时的情况，说他生了淋巴结核，脖子全部溃烂，人都快不行了，经党组织同意才由他的福建同乡、国民党军长张贞出钱把他担保出了监狱，然后被接到西山养病。

其实，这些话，在办公室里闲暇时陈伯达也都讲过，现在是旧地重游旧话重提，边走边说。

我们沿着南边的山路上山，道路的两旁都是深绿色的松柏树林。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没有一个游人，显得格外寂静，微微的山风吹来，身上便感到有些凉意。走到半山腰时，看到脚下的土路面上，由红卫兵用粉笔写着斗大的标语口号：“打倒李先念！”沿坡以下至少有三四米长。陈伯达走在前边先看到，他急步走去说：“李先念不能打倒。”说着便用脚在路面上擦，并顺手从路旁捡起一块白灰石，在地上以同样大小的字，改写为：“打倒陈伯达！”

我们劝他不能这样写，他半笑着说：“怎么不能呢？应该打倒陈伯达。”这实际上是陈不便说出的一种内心之苦的发泄。

他这样做，跟随去的两三个警卫人员，就在后边用脚抹去字迹。再往上走了一段，又出现此类的标语，陈伯达还是照旧去改写为“打倒陈伯达！”我们劝说他不要这样做，这样做会给公安部门找麻烦，陈说：“没关系，打倒吧！”随去的刘叔晏，若有所思地低头不语。

当时，中央常委外出时，警卫随车上都装有步话机，随时都可以与家中取得联系。当然江青的随车上也有，而后来据说江青怕人窃听她的行动，所以下令统统取消。这样，我们外出就与办公室失去了联系。

来香山时家里并不知道，王文耀怕出来太久，家里有事找不到陈而着急。因此，走到半山坡时，王便提醒陈伯达说：晚上七时中央文革有会，早点回去吧。这样，陈伯达一行人便回转下山了。

回到钓鱼台进北门，到十六楼附近，陈伯达下车去十六楼中央文革开会，王文耀同时下车回十五楼办公室，俞子云开车送刘叔晏回新建胡同家中。

王文耀一人回到十五楼办公室，王保春就忧愁不安地对王文耀说：“你们可回来了！”

王文耀说：“首长去十六楼开会去了，出什么事了？”

王保春说：“小姐（指肖力）和办事员一连打来两三次电话，说傅崇碧要进钓鱼台，让报告组长。我说伯达同志出去了。她不等说完就将电话挂了。奇怪，从来没有叫过‘组长’，而且那么急。”

保春把每次来电话的急促语气向文耀学了一遍，然后说：“我不知你们去哪儿了，让值班室（警卫值班室）找你们也找不到，她那么急，我以为让我通知东门，我只好电话告诉东门的警卫室让傅司令进来，也不知道这样办对不对。唉，真不知道又要出什么事！”

我们俩都在不安地猜想着肖力是什么意思：她自己就有批准权，可以直接批准傅崇碧进来，为什么反复告诉我们报告“组长”呢？而且已经告诉她“组长”不在，她又一概不听，还是反复说一句话“报告组长”？再说傅崇碧是卫戍区司令，过去不都是随便进出钓鱼台吗？实在猜不出来这是为什么！

保春在办公室里忐忑不安，文耀如坐针毡，两个人连文件也看不下去，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什么事情。

大约到晚上九点多钟，陈伯达没有开完会便从十六楼回来，他问王保春：“傅崇碧是你让进钓鱼台的？”保春说：是呀。陈说：“你为什么让他进来呢？”保春不解地说：“你看，他是卫戍司令，来找你，我怎么能让他等在门外边？这在礼节上也说不过去呀！”陈伯达一脸不高兴地说：“你要写个检查！”保春就把肖力来电话的经过讲了一遍。陈伯达也相信保春说的情况，但又叹着气说：“江青他们在会上说傅崇碧是我这里批准进来的，傅带着人闯进了十六楼，说我是引狼入室，说要你写检查，现在就写。”

保春说：“伯达同志，这个检查怎么写呢？”

陈伯达说：“你就写你为什么不经请示就同意傅崇碧进来。”

王保春十分委屈地说：“你不是出去了，找不到你嘛！”

陈伯达说：“你就写吧，写吧，我等着。”

保春说：“那就写吧！反正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些，我也不会瞒着。”

保春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写检查，陈伯达坐在沙发上，无可奈何地微微地摇头、轻声叹气。

保春写完检查后，交给陈伯达看。陈草草地看了一下后就从沙发上起身，拿着检查急匆匆地去了十六楼。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陈伯达又拿着检查回来了。陈对我们说：“江青他们认为写得不好，认识不深刻，上纲不够高，没有触及灵魂，让你重写。”

保春听了非常懊丧，恼火地说：“傅司令经常出入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这是他的工作。他到钓鱼台多少次，为什么这一次进钓鱼台就不许进来？也没有告诉过我傅崇碧不能进钓鱼台，我的检查怎么写深刻？反正也就是这么个过程，还要怎么上纲？”

王文耀在一旁对陈伯达说：“您也为我们说句话，您看总理，上次在一个会上，您问总理，主席批的文件已转给您了，看到了没有？总理说没有呀！关锋在一旁对总理说，那一定是您的秘书给压下了！总理便严肃地对关锋说：哎，同志，您怎么能这样说呢？！您看总理多为工作人员说话！”

陈伯达说：“唉，没有办法，让你写你就重写吧。”

保春只好把事情的发生过程写得更详细一些，但是上纲怎么也拔不上去。这时陈伯达在一旁拿过笔来，在保春写的检查上亲自给上纲，什么“狂妄自大，不经请示任何人，便擅自同意”等话，把检查里提到肖力的名字也划去了，嘴里还说着：“纲上得越高越没有用！”写完以后陈让保春重抄了一遍。王保春很生气，在抄写时又加上了：由于本人水平低，不宜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要求调离。保春抄完后交给陈伯达时说：“我还是离开您这儿吧，不要给您惹麻烦。”

陈伯达接过王保春的检讨以后，便在上面批了：“我对自己工作人员教育不严，建议调离工作。陈伯达。”

这时我们空旷的办公室里一片寂静，三个人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陈伯达用非常低沉的声音说：“我无能，不能保护你们，很对不起你们，你们

跟我吃苦了!”说完，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办公室去十六楼交差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王文耀坐在办公桌前，王保春仰面躺在床上叹着长气说：“我还是走，离开这儿。”王文耀说：“不能走，现在这么乱，两派斗争，你随哪一派？”王文耀虽然嘴里这么说，但心里也开始考虑着两人的去向问题了。

其实，王保春、王文耀早有预感，江青今天终于发难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十七楼吃饭时，碰到了康生的秘书黄宗汉。黄秘书神秘而小心地坐在王文耀身边小声地说：“保春那个检讨我看了，这件事还在常委中传阅呢！真不得了了！”江青在王保春那份检讨上写着两条批示：“检讨了就好，一，王保春同志应在组织生活会上作深刻检查，以使其他同志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二，王保春同志的去留问题由伯达同志自己决定……”

这个批示汪东兴在当天晚上夜餐之后，在钓鱼台十七楼内，就召集钓鱼台各楼秘书及有关工作人员，开紧急会议传达，让大家引以为戒。

过了几天，一次在钓鱼台四号楼开会，王保春也去了，没有注意江青从他的身后走来，江用手拍着王保春的肩膀假惺惺地说：“王秘书，对不起，不要生我的气啊！……”王保春回过头看江青时，她已走过去了，保春也就作罢，走开了。

三、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江青虽然在王保春的检讨上批了去留由陈伯达决定的话，但是王保春反复考虑后，还是决定要走。就在这时，江青对陈伯达说：“怎么王保春还没有走呀！”

陈伯达为了不让江青再找自己的麻烦，同意王保春离开。

王文耀不同意，认为留自己一个人，工作量太大，忙不过来。

这时，陈伯达便告诉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为他再调一位秘书来。汪东兴很快送来两份人事档案，让陈伯达任选一名。陈将档案交给王文耀为他选人。王认真地看过档案后，选定了缪俊胜同志，陈伯达表示同意。

王保春走，去哪里呢？王文耀问陈伯达。陈伯达很平静地说：“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就回中宣部吧，我也不是管干部的。”

中宣部这个时候已经被打倒解散了。全部人员被集中在北京市委党校办学习班，其内部也分成了几派，在互相争斗着。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王保春怎么能去，去了怎么表态，站到哪一边呢？王保春很为难，但又不好向陈伯达说。

王文耀感到不公，便对陈伯达说：“保春不能回中宣部，你知道中宣部已经不存在了，又那么乱，都在打派仗。保春在你这里工作这么多年了，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你不能不管。”陈伯达说：“那你说怎么办？”王说：“就派他到你管的单位去工作。《红旗》杂志社，因为姚文元管，可以不去，而马列主义研究院要解散，人员不是在待分配工作吗，保春可以同他们一起分配工作嘛！”陈伯达听后想了一下，点点头表示同意。

因为康生、江青老是盯着陈伯达管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几次在中央文革开会时说研究院的革命不彻底，是因为陈伯达在护着。因此，陈伯达才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说将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还恢复延安时期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毛主席看后圈阅同意，将文件退给陈伯达，陈便以此为据，解散研究院。

陈伯达决定先让王保春去帮助他做解散研究院的善后工作，然后，可以暂时为王保春找个适当的工作单位过渡一段时间。这个决定，陈伯达再三交待不能让十一楼（江青）知道。王保春也同意这样安排。

王保春去研究院，陈伯达交给他的任务是：从教职员工中挑选十个人留下来，恢复中央政治研究室，组建新的政研室人员的条件是：1，历史清楚，有一定的写作水平；2，尽量不留文革前发表过文章的有名望的老同志（原因是怕康、江借此找岔）。其他人不设职务，就由史敬棠为研究室秘书，主管其事即可。其余人员全部分配下去。为此，陈伯达与李富春同志通了电话，说请他帮助将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人员安排下去，具体情况让王保春当面向富春同志作汇报。

陈伯达对马列主义研究院这批人，还是非常关心的，因为他们是从全国各地选拔来的尖子，动哪一个他都感到舍不得。这是我们从他的表情言谈中看出来的，现在这样做确实是出于无奈。

王保春看出他的心思，就对陈伯达说：“您看是否给李雪峰同志联系一下，可不可以河北省地区安排一些人去。这些同志我想把他们安排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待您要用时可随时将他们调回来。”陈点头认可。王保春向李富春同志报告分配方案时，将这些同志大部分安排在河北地区及北京的首钢等地。

后来，到1969年进行所谓“斗、批、改”时，需要大批这方面的人才。当时李先念、纪登奎等同志，还多次口头向陈伯达提出，要求给他们一些秀才。陈当时笑咪咪地表现出得意的样子。这是我们亲耳听到和亲眼看到的。

王保春在自身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协助领导顺利地组建了中央政治研究室，比较妥善地分配、安排了马列研究院的同志。陈伯达高兴地给李富春同志去电话，表示感谢，并且笑着对我们说：“嘿，富春同志对王保春的工作很赞赏，他说让王保春作个省委书记没问题！当然了，富春同志是作过组织工作的嘛。”

（作者为陈伯达原秘书）

□ 《世纪》2010年第5期

~~~~~

## 【不堪回首】

我所经历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

• 许人俊 •

“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机关到各地方机关，曾发生自上而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一时间，全国党政军机关、学校兴师动众，全力投入清查运动。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长期隔离审查、批斗、监督劳动，丧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当时，我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以下简称国务院农办、农政）工作，亲历全过程，了解清查“五一六”的起因、发展和结果，有切身感受。

国务院农办、农政是中央农林口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统管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农机部、林业部、中央气象局及所属大专院校的行政业务和政治工作。

“文革”开始后，按中共中央指示，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立即成立农林口文革小组，秦化龙奉命任中央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统一负责领导农林口的“文革”运动。

1967年9月，康生、江青、谢富治在红卫兵会议上，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布：秦化龙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后台”。于是，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从此成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本营”，接着农林口各部开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在漫长的清查过程中，不仅中央农林政治部主任秦化龙被作为“五一六黑后台”长期关进秦城监狱，国务院农办副主任梁步庭、杨煜，农政副主任王振扬，林业部政治部主任吕清，农业部副部长吴振等大批高级干部，统统被划为“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农垦部部长王震也被列入“五一六黑后台”的黑名单。

我是秦化龙的秘书，又是同他一起从上海警备区调进北京的，因此，被划为秦化龙的“亲信”和“五一六重要骨干”，长期遭到关押并经受专案审查。

“文革”初期，江青等人借“一月夺权”和反“二月逆流”，在中央机关制造混乱。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时，北京农业大学极少数红卫兵以纪念为名成立“五一六兵团”

1966年5月，康生、陈伯达等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确定了一整套“左”的方针、政策，它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1967年初，张春桥、王洪文等在上海策划“一月夺权”，毛泽东高度赞扬“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并指示中央文革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致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肯定“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这大大鼓舞了首都红卫兵的夺权热情，他们纷纷要求参与中央机关夺权斗争。

尽管当时中央机关许多领导对上海夺权“不理解”，认为中央机关的权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普遍反对在中央机关搞夺权，但出于对领袖的信任、崇拜，有些人还是响应号召，布置自己信任的群众组织抢先夺权，避免造成工作被动。

我们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就是如此。

机关一部分人按照领导安排夺权，宣布成立“国务院农林口革命委员会”，由机关红卫兵、工人造反派实行一派掌权。并模仿上海“一月夺权”的做法，发布一号通令，宣布机关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实行围攻、抄家、抓人、打人、监督劳动。原先平静的机关，顿时形成对立的两派。

恰巧此时，谭震林、陈毅等在“文革”问题上，与江青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发生意见分歧，出现激烈争论。康生、陈伯达、江青等马上借题发挥，炮制了一个“怀仁堂事件”，并在毛泽东面前诬告谭震林、陈毅等人反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搞二月逆流，复辟资本主义”。

还指责谭震林在农林口搞假夺权，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

江青等人策划的反“二月逆流”战斗打响后，各院校的红卫兵闻风而动，纷纷进驻农林口各部机关，顿时农林口机关局势大乱。

大批红卫兵在中央文革支持下，进驻农林口机关安营扎寨，到处寻找反谭震林的炮弹。他们发现：当年创建解放军南京路上好八连有功的上海警备区政委秦化龙，正在农林口机关大院被作为反党分子遭受批斗；在农垦部，他们又发现王震也被作为反党黑帮批斗；他们的秘书和同情者，同样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于是，红卫兵们决定为秦化龙和王震等打抱不平，强烈请求周恩来为他们平反。

有一次，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王震时，当面说过：“王胡子啊，听说有人要打倒你，你是打不倒的！”王震问题显然已不成问题，剩下让周恩来操心的是秦化龙问题。

五一劳动节后，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国务院农办、农政及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林业部、中央气象局机关干部和院校红卫兵的代表，广泛听取大家对秦化龙问题的意见。周恩来当场明确指示召开秦化龙问题辩论会，希望通过辩论，弄清是非，消除分歧。

然而，江青等人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对毛泽东、周恩来在五一劳动节，安排几位老师和副总理上天安门城楼心怀不满，暗中唆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首都红卫兵中，进一步煽动极左思潮，散布“牢牢掌握大方向，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新反扑”，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斗争目标明显对着周恩来。

在5月16日那天，进驻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的北京农业大学极少数红卫兵，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利用《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纪念日，宣布成立“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并贴出“成立宣言”，声称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那些混进党和政府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宣言还要求“应旗帜鲜明地为秦化龙将军平反、翻案”。宣言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周恩来，但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

周恩来一向受大家尊敬，特别是不久前多次接见我们，指示开辩论会解决秦化龙问题，我们非常感激。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居然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我们十分恼火，立即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批判。同时找组织“五一六兵团”的红卫兵头头谈话，严厉责备他们不顾大局，无事生非，给我们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运动添乱，制造麻烦。

好在他们人数极少，年纪轻，思想转变快。受批判谴责后，他们马上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解散“五一六兵团”，并停止一切活动。

“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虽然短命，只有一天历史，但后来却给大家带来无穷灾难。

“五一六”思潮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周恩来主张进行思想教育，正面引导。但江青等人借题发挥，贼喊捉贼，利用抓“五一六”排除异己



农大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出现，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时代背景。

“文革”初期，江青等人继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后，又打倒了陶铸。接着，指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趁热打铁，在狂热的红卫兵中散布“当前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旧政府（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矛盾”，矛头直指国务院。

为了搞垮“旧政府”，他们编造谎言欺骗毛泽东，掀起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狂涛骇浪，策划将谭震林、陈毅、李富春、徐向前等七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统统打倒，从而试图搞垮“旧政府”。

当时，江青等人的图谋未能得逞，但仍不甘心。于是，1967年5月，他们借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纪念，再次煽动红卫兵，打着纪念、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旗号，兴起极左的“五一六”思潮，建立公开的或秘密的“五一六”组织，制造社会混乱。

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才出现了农大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就在这一时期，北京天安门、长安街、王府井等处也突然出现“火烧李先念”、“油炸余秋里”、“炮轰徐向前”这一类标语、传单，落款均为“五一六”。他们还在首都繁华地区，秘密散发题为《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宣传品，攻击周恩来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这些号称“五一六”的组织，突然不约而同地出现，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潮。其不同点是：驻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的农大“五一六兵团”，是公开的红卫兵组织，而且只成立一天，参加者有名有姓；后者则是在夜间秘密活动，经常神出鬼没，行动诡秘。

广大群众对这些肆意攻击周恩来的恶劣行径极为气愤，强烈要求严惩。不久，秘密活动的“五一六分子”（首都钢铁学院的红卫兵），很快被群众和公安机关抓捕，“五一六组织”遂告瓦解，不复存在。

其实，无论是农大“五一六兵团”，还是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它们都是“文革”时期在林彪、江青煽动的政治思潮下出现的产物。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所有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群众，都争先恐后地用“东方红”、“井冈山”、“延安”、“红旗公社”等革命色彩鲜艳的字眼，建立造反组织，标榜自己特别革命。甚至荒唐提出“一切权力归×××”的极左口号。用“五一六”命名造反组织，就属于这一类型。

1967年5月以后，江青等人认为全国乱得还不够，提倡“越乱越好，乱了敌人，锻炼自己”。于是，他们指使王力、关锋、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不断鼓动红卫兵大闹特闹，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推向高潮。

到了七八月间，全国混乱局面达到了高潮，冲击领导机关，揪斗党政军领导人，抢劫军火的恶性事件频繁发生，局势严重失控。

于是，毛泽东及时发出最新指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警告造反派和红卫兵头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他还要求学生“复课闹革命”，各单位组织“大联合”，进行“斗、批、改”。

尽管“五一六”攻击的矛头是对着周恩来的，但他认为那是红卫兵中少数人的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对学生主要应该进行思想教育，着重正面引导，没有必要扩大追查范围。

当时中央文革记者站北京组组长袁光强曾经回忆，他最早发现“五一六”的标语后，马上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汇报，后组织了“五一六调查组”。经过一两个月深入、全面、认真的调查，查明秘密“五一六”的头头是北京钢铁学院的红卫兵，所有骨干分子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捕。

事后，这个直属中央文革小组的记者调查组，曾经实事求是地向中央文革及时写了调查报告，说明“五一六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已被彻底摧毁，不复存在”。

然而，江青等人却违背事实，继续借题发挥，在“五一六”问题上大做文章。

就在记者调查组提交了调查报告后，他们却精心策划把一大批军内外领导干部，无中生有地同根本不存在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挂起钩来，进一步排除异己。

在此之前，他们首先拿农林口秦化龙问题做文章，以求“一箭数雕”：

一来，因为秦化龙曾是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后调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担任主任，“文革”初期还任中央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参与中央文革开会汇报活动，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经常上天安门陪同中央领导人接见红卫兵，报纸上有名，广播里有声，有社会影响。二来，林彪、康生他们也知道周恩来十分关注秦化龙，曾在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组织辩论会，想通过解决秦化龙问题，要求为平息中央机关派性斗争做榜样。三来，他们还知道1940年马明方、秦化龙等100多人在新疆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是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解救回延安的。秦化龙等人的“叛徒”问题大有文章可做。四来，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不久前又出现过农大“五一六兵团”。

所以，1967年9月初，康生和江青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突然宣布：“革命小将们，秦化龙不是好人，你们要提高警惕啊！他是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还有新疆叛徒集团的问题。你们不要保他了，要反戈一击、立新功啊！”

反“二月逆流新反扑”和清查“五一六”如出一辙，是江青等人一手策划的政治事件，以便从不同方向排除异己。

1967年9月后，首都红卫兵开始返校“复课闹革命”，工宣队、军代表相继进入学校和国家机关，实行群众组织大联合。轰动一时的红卫兵运动偃旗息鼓。五大红卫兵“领袖”失去价值，不再成为依靠的力量。不久，他们的政治命运走到了尽头，先后成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纷纷被逮捕关押审查。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毛泽东特地指示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该予以彻底揭露。

毛泽东指示公开发表后，江青等人看到形势不妙，马上采取丢卒保车、贼喊捉贼的手法，抛出经常出头露面、煽动造反的头面人物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替罪羊，公开宣布将他们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逮捕，以平息毛泽东的震怒。

进入1968年后，江青等人又玩弄政治权术，在军队领域相互勾结，开始导演一场新的夺权斗争。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策划制造了一个“杨、余、傅反革命事件”，诬蔑在解放军担任重要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诽谤他们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3月27日，中央文革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

就在这一期间，江青等人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担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违背周恩来关于着重思想教育的指示，极力夸大“五一六”的组织和活动能力，任意扩大清查范围。

1969年9月以后，国务院农办、农政和农林口各机关干部，分别下放到湖北、江西、河南农村办“五七”干校，开展斗、批、改。

不久，中央机关“五七”干校很快就按照江青等人统一部署，大规模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运动。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军代表宣布：中央已将秦化龙定为“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正式批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我们这些保秦化龙的干部，立刻被划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骨干，实行专政，隔离审查，残酷斗争，强迫交代“五一六反革命”罪行。

为了大造声势，发动群众，掀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的高潮，1970年元旦刚过，干校军代表特地召开逮捕大会，宣布：经中央批准，将农林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吴文平（上海警备区宣传部原副部长）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骨干”，由公安机关正式逮捕入狱。会上，农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扬、宣传部长黄天祥、教育处长刘子兵和我，分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后台和骨干陪斗。

随后，“五一六”专案组趁热打铁，突击审讯我们，大搞逼供信。他们实行三班倒审讯法，有一次，竟对我连续进行三天三夜72小时残酷审讯。幸亏当时我年轻，身体好，意志坚强，终于挺过了磨难。

由于清查“五一六”扩大化，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和农垦部、农业部一些干部不堪侮辱虐待愤而上吊或跳井自杀，有的干部吓得逃离干校。类似情况，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197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制止逼供信，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只有一个‘五一六’。”这实际上是鼓励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

令人费解的是《通知》竟然把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文革”初期帮助林彪、江青等人搞阴谋诡计的“王、关、戚”等并列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操纵者。

《通知》下达后，农林口机关和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的清查运动，不但没有收缩，反而进一步“深挖”扩大。

那时，农林口干校到处张贴“坚决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大标语。周围农民搞不清楚，他们好奇地问：“你们干校只有200多人，怎么会有516个反革命分子？！”原来他们把“五一六”当成数字理解，并没有当成“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理解，令人啼笑皆非。

然而，“文革”风云瞬息万变，变幻莫测。

1970年8月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同林彪集团秘密串联，抛出了“天才论”。没有想到毛泽东恼怒地指责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从此，陈伯达由政治舞台的巅峰突然跌入谷底，曾经赫赫有名的全国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陈伯达，一夜之间反而被说成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操纵者。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专案组突然召集我们开会宣布：“你们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林彪，已经彻底完蛋了！”我们听后一头雾水，面面相觑：到底谁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谁又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大家哭笑不得，莫名其妙。

粉碎“四人帮”后，原有的“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自杀。“五一六反革命”案真相大白，它完全是阶级斗争虚构的冤假错案。

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农林口干校清查“五一六”专案组摇身一变，又成为反林彪的英雄好汉，他们继续对我们进行审查。不过方式有所改变，不再是残酷斗争审讯，而是改为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天天让我们反复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要求联系思想，活学活用，交代“五一六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五一六”组织，他们退而指点“迷津”：“既然没有‘五一六’组织，那就交代‘五一六’思想吧！”

1974年，设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的国务院农办、农政“五七”干校宣布撤销，清查“五一六”专案组也解散了。被关押隔离审查5年多的我们，终于获得自由，被允许回北京同家人团聚。

但“五一六”问题并没有宣布结束审查，要我们在北京家中继续等待处理。秦化龙依然关押在秦城监狱里，吴文平也依然关押在湖北沙洋监狱里。

后来，政治形势开始有所变化，我们也不甘心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心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是“五一六”，以便营救仍然身陷狱中的秦化龙和吴文平。

有一次，我和上海警备区党委办公室原主任刘子兵相约，一起去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局长刘传新。

刘传新曾经担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龙是他的老领导，吴文平、刘子兵和我都是他的老部下。我们调离上海警备区后，刘传新调到南京军区任某军政治委员。“文革”期间，他随部队进北京执行军管任务。过去，我们都十分熟悉，他进京后与我们也有过接触交往。

多年不见，刘传新在天安门附近的办公室热情接待我们。对老首长秦化龙和老部下吴文平的悲惨遭遇，他早有所闻，也深表同情。那时，江青等人还在台上，我们希望从他那里探听一些有关“五一六”的信息。谁知他眉头紧锁，苦恼地指着办公桌上一大堆档案说：“你们看，我在北京市抓了许多‘五一六’，关在监狱里，材料一大堆，至今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接着，刘传新伤感地对我们诉说：“我在这里抓‘五一六’，我妻子在江苏却被人家当做‘五一六’抓起来，至今还关押审查啊！究竟什么是‘五一六’，我也说不清！”

刘传新是奉命进京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使命的军政治委员，又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公安

局长，居然也说不清楚什么是“五一六”问题。

时隔不久，“四人帮”被粉碎，因刘传新为“四人帮”在北京办了不少事，群众愤怒，强烈要求审判他。刘传新自杀了。

同样，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也选择了自杀之路。

至此，曾经轰轰烈烈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就成为“文革”史上一幕既可悲又荒唐的历史。

后来，我们单位当初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被捕的吴文平等人也出狱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分配了工作。

在这之前，胡耀邦曾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秦化龙问题，作出结论指出“把秦化龙同志作为叛徒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长期关押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因秦化龙在狱中受迫害致残，已经丧失工作能力，中央特地任命他当顾问。

农林口其他被诬陷为“五一六后台”的梁步庭、吕清、王振扬、吴振等人，也统统恢复名誉，相继分配了工作。至于农林口司局和处以下干部中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人数更多，也都分配了工作。

对于“五一六”问题，胡耀邦感触很深。“文革”期间，他在团中央“五七”干校目睹那么多熟悉的好同志，一个个莫名其妙被打成“五一六”；粉碎“四人帮”后，他受命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又发现自己熟悉的许多优秀干部，也因被打成“五一六”在不断告状，人数之多相当惊人。他审阅了许多历史资料发现：虚构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根本就不存在。他极为气愤地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几个数字吗！于是，胡耀邦下大决心，大刀阔斧为“五一六冤案”众多的受害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历史证明，当初耸人听闻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纯属自上而下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教训极为深刻，令人永难忘怀。

□ 《党史博览》2010年第8期

~~~~~

【史海钩沉】

1966年封闭《红卫报》（原《羊城晚报》）事件

• 叶曙明 •

文化系统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前沿。1966年10月，广州市委宣传部主管文化工作的副部长、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华嘉，成为广州市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领导干部。10月10日，《广州日报》报道了揪出“本市文艺界起立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华嘉的消息，并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是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据《广州日报》的报道，对华嘉的批判，实际上从6月以后已经开始了，除了大字报的揭发批判外，“并在市委直属机关、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系统中，分别召开了声讨大会，进行了多次的批判斗争”。报道公布，经请示上级党委批准，已撤销了华嘉所担任的职务。

广东省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判的干部是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田蔚。她是王匡的妻子。据田蔚的好友、中南局干部沈容回忆，“在全国解放以前，田蔚在新华社总社广播部工作”，“以后她一直在广东广播电台，后来又筹建了电视台。可以说广东的广播、电视都是在她主持下建立的。”“不幸的是，这时，她竟成了第一个在广东省报刊上被点名批判的，对‘文革’领导不力，‘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报上一批，她的下落也就不明了。”

到1966年底，造反派的行动逐步升级，变得愈来愈具攻击性和破坏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揪斗一两个“走资派”，而开始对机构、体制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根本的质疑。毛泽东曾把文革的任务归纳为“斗、批、改”，现在他们急不可待地自发地迈出了“改”的一步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以为只是在文化系统，所以市委成立了一个文革领导小组，由管文教的书记薄怀奇当组长，我们那时是不管这些事的，当然作为市委来讲，总的还是要讨论，要研究，但具体的事情由他来管。后来到大串连开始以后，那就不光是文教系统了，整个单位都动员起来了，从省委到市委，整个单位来管了。

从开始批“三家村”，批《海瑞罢官》，那时还局限于文教系统，后来，特别是8月以后，北方红卫兵南下来串连以后，已经扩大到工厂，扩大到农村，领导小组已经领导不了了。省委也好，市委也好，都不能不直接抓了。那个领导小组无形中就撤销了，不起作用了。全部由省委直接抓。

广州真正形成两派，是从查封《羊城晚报》开始的。那时候一个要封，一个不让封，就这么形成两派。以后一派“革命”更厉害一点，一派比较温和一点，就是所谓“保守派”。两派一搞起来以后，地方实际上就管不了了，那就要军队插手了。

《羊城晚报》是广州3家报纸中，受冲击最大的一家。广州的文革是从批秦牧开始的，而秦牧曾经担任《羊城晚报》的副主编；中南局最早挨斗的负责人是王匡，而他作为中南局的宣传部长，一直是分管《羊城晚报》的。更重要一点，陶铸在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期间，对《羊城晚报》，一向格外垂意，呵护备至。因此，当造反派的重炮口开始对准陶铸时，《羊城晚报》便不可避免地，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造反派对《羊城晚报》副刊《晚会》“放毒草”作了一个统计，“1960年毒草66篇；1961年毒草28篇，有严重问题的34篇；1962年毒草129篇，有严重问题的69篇。仅3年中，共计毒草223篇，有严重问题的103篇。这些作品中，有攻击党和大跃进和吴晗相呼应、相配合的；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的；有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有鼓吹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的；有封建主义、封建迷信、低级趣味的”。

对《晚会》的作者，也作了一个统计，“《晚会》作者有150人。调查了110人，其中工农兵仅占4人，占3.7%；教授、讲师、医生、教师和研究生为43人，占39.1%；文史馆人员15人，占13.7%；新闻、电影、文艺工作者22人，机关干部22人，各占20%；无职业的4人。从已查明的40人的政治面目，反动军官、伪官吏、文人、反动党团骨干共有7人，占40人的17.5%；地、富、反、坏、右共6人，占15%；劳改犯和其他坏分子4人，占10%；被罢官和有其他问题的人15人，占37.5%。以上共占80%。”

按造反派的标准，大凡知识性、趣味性、文艺性、多样性、地方性，都是抹杀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任何生活情趣、娱乐、消闲，甚至生活常识，都有可能成为“毒草”，诸如“薛觉先生活二三事”、“红线女温泉游泳”、“元代女艺人朱廉秀的知心朋友是谁”、“大象结婚”、“邮寄外甥女”、“五位幼女成了小天使”、“满塘彩色写金鱼”、“畅谈养生之道”之类，统统属于“无

聊之极，庸俗之极，长期腐蚀广大群众”的毒草。而作者除了工农兵之外，其他全部是有问题的。

造反派认为，“不仅《晚会》上毒草大量出笼，其它专栏也是如此，如《五层楼下》，比晚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罪证之一，就是香港报刊多次转载过它的文章。“仅仅《五层楼下》一栏，被香港反动报刊《晶报》等转载的就有160多条，3万余言，有的还是只字不改全文刊载，成了香港的分店。香港最反动的《星岛日报》专门辟个‘羊城怪现象’专栏来转载《五层楼下》的黑文，仅1963年3月到1964年7月的10多个月中就转载了7.8万多字”。

《广州日报》原来是从《羊城晚报》分出去的，为了保住《羊城晚报》，陶铸在8月曾建议把两报重新合并，改名为《广州晚报》。但事实上，要合也不易，8月底，广州日报社的部分群众，贴出了炮打萧洪达（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丁希凌（中南局宣传部秘书长、羊城晚报社党委第一书记、社长）的大字报，导致两社的干部群众严重分裂，双方分庭对垒，激烈辩论，甚至爆发冲突，矛盾十分尖锐。

羊城晚报社内部，也陷于重重矛盾之中。矛盾的焦点，在所谓的“黄伟经事件”上。这也是后来红卫兵封闭《红卫报》的主要理由之一。支持封报的“封报派”和反对封报的“反封派”，对这一事件，各执一词。

“封报派”称：

黄伟经（出身贫农、党员）在运动的第二阶段首先贴了工作队和党委当权派萧洪达、丁希凌的大字报，并串连几个革命同志写信给中南局和毛主席，就因为这样，黄伟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其原因是：一、搞地下串连，组织反革命集团。二、反对工作组。三、反对党委。当然，把黄伟经打成反革命分子后，工作组还去搜集了不少“理由”，就这样，黄伟经被公安厅抄家，本人被突然扣留，隔离停职反省。他被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小房子里长达4个月。吃饭由人送，报纸不让看，大小便也得受监视。

“反封派”则称：

1、黄伟经何许人也？

他是《红卫报》经济部副主任（中层骨干），中共正式党员。在运动中，群众揭发他的大字报多达167张。据调查他是王匡、杨奇（羊城晚报总编辑——引者注）、秦牧、何军等人的忠实走卒，被列为《红卫报》的八大尖子之一。像这样的人算不算革命群众或一般的干部？

2、黄伟经的主要问题：据我们向有关部门和群众调查，悉知：他和苏修分子格里曼（该人系苏联工程师，极力吹捧赫鲁晓夫、吹嘘二十大、反对莫洛托夫，谩骂中国妇女代表团）通信长达9年之久，没有向组织反映，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被揭出来，他还经常向苏修索取文章准备翻译……

黄出国访问归来后，给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二联驻穗办事处的人作报告，还在前《羊城晚报》发表两篇文章，严重地泄露了国家机密，××领导机关曾就此案作了追查。类似泄密现象非止这些，由于关系到国家秘密，我们不便在此多谈。仅从这点黄早就构成犯罪。难道公安机关对这样的人施以专政还有什么过错吗？

红卫兵还指控《红卫报》的当权派，“大部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蛋”。今年“直至6月

6日到7月的一个月里，就有15天没有刊登毛主席语录”；另外一项罪名，今年3月间，以“二盏路灯”为题，刊登了暴露性专题报道，“以广州一条小街缺路灯为名，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干部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份题为《坚决改组〈红卫报〉！彻底清算前〈羊城晚报〉的滔天罪行》的传单里，7个红卫兵组织（其中两个是外地的）联名质疑《红卫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从今年5月至现在，半年来《羊城晚报》对整个中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不推动不促进，除发表过一篇社论，‘向英雄的红卫兵致敬！’之外，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评论、社论。以10月份为例，10月2日《红卫报》转载了《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以后，这一个月里，仅仅在6条消息中简单提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句话，根本不报道、不宣传中南地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好形势。”

12月13日，由“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领衔，24个广东和外地的群众组织，包括“中山大学八·三一红卫兵”、“中山大学一一·七战斗队”、“华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旗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第四野战军广州地区联合造反兵团”、“珠影东方红公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穗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穗联络站”、“驻《红卫报》南下革命造反团”等，联合发出封闭和接管《红卫报》的通令：

- 一、封报期间，《红卫报》暂时由工人、红卫兵和革命干部接管；
- 二、封报期间，不准以任何借口，调离该单位的一切工人、行政干部和记者的工作岗位；
- 三、封报期间，不准以任何借口把当权派调走，回避运动，逃避斗争；
- 四、封报期间，一切工作人员的工资照发；
- 五、必须彻底改组《红卫报》报社，在未改组以前，不准以任何借口擅自复刊、迁移；
- 六、封报期间，原《红卫报》的订户问题由中南局负责处理；
- 七、以上各条，必须遵守，如有违抗，所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全部由中南局和广东省委负责。

同时，这些群众组织还在当天下午2时30分，发表《就〈红卫报〉（前〈羊城晚报〉）被封告中南地区革命人民书》：“不封《红卫报》行不行？我们说：不行！不行！！《红卫报》（前《羊城晚报》）必须进行彻底改组。实际上《红卫报》（前《羊城晚报》）已经混不下去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们今天封闭旧《红卫报》，宣判它的死刑，就是为广大革命同志明天能够看到真正宣传、传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红卫报》，看到真正起到教育人民群众，组织和鼓舞人民群众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英勇斗争的新《红卫报》。”

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首先作了书面表态：“我只代表我个人支持革命同学和红卫兵们封闭红卫报的革命行动。”同时，他向报社作出3点指示：一、报社职工要支持封闭《红卫报》的行动；二、封闭期间，工资照发；三、职工们要等待分配工作。12月15日，中南局宣传部正式发出了停刊通知。

一石激起千重浪。封闭《红卫报》的行动，迅速导致群众组织严重分裂。一部分热烈支持，而另一部分则强烈反对。“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大专院校总部”、“广州发电厂红旗战斗队”、“广州重型机器厂红色战斗兵团”、“广州红江织布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广州纺织机械厂红色工人战斗兵团”、“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人赤卫队”，联络广东省气象局、广东省电业局、广州市果品公司和一大批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联合组成了“中南地区反对封闭、停刊《红卫报》联络总部”。

12月23日，一份题为《就〈红卫报〉被封和停刊事件，告中南地区人民书》的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散发。传单指出，“《红卫报》拥有37万多订户和成千上万的读者，封闭者无视

广大革命群众迫切需要通过党报倾听党中央的指示，倾听毛主席的声音，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大事，文化大革命的大事，单方面地悍然强行封闭《红卫报》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文革以来，广州地区成立的不计其数的群众组织，从封闭《红卫报》事件开始，逐渐分裂成两大派，并出现跨行业、跨地区的趋势。这一事件，对广州局势的影响，至为巨大。由于在群众组织中，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12月28日，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都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对事件作出解释，并重申支持立场，否定了启封和复刊的要求。

中南局一封《关于〈红卫报〉问题给革命群众的公开信》称：“今年2月份以来，《红卫报》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对推动中南地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应当肯定。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陆续发生了不少重大错误；在报社内部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南局派去的工作组和报社领导也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这些，中南局是负有责任的。报社的这些严重错误，一直改正得很迟，很不得力，因而激起了革命小将们的愤慨，采取了封报的行动。革命小将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对他们这一革命造反精神，我们坚决支持。”

尽管《红卫报》是面对中南5省的，但只有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向广州市人民作出了公开表态，完全肯定了封报行动。“省委、市委认为，24个群众革命组织封闭《红卫报》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决的支持。”

中南局和广东省委想平衡两方，在黄伟经问题上，他们站在报社党委和“反封派”一边，支持对黄伟经实行隔离停职审查；但在封闭报纸问题上，他们却站在“封报派”一边，支持封闭《红卫报》。然而，黄伟经问题，毕竟在社会上影响不算太大，而封闭报纸，可就兹事体大了。因此，事情的结果，是使天平的一端向“封报派”那边沉下。

“反封派”没有能够启封《红卫报》，“封报派”也没有能够拿出一份新的《红卫报》给读者。对《红卫报》被封问题，他们到最后也没有取得一致认识。直到13年后，文革已成陈迹，1980年2月，《红卫报》才重新以《羊城晚报》这个老招牌正式复刊。

□ 《广东史志》2002年第4期

~~~~~

## 【荒唐年代】

### 文革中的学毛选闹剧

• 任予怀 •

文化大革命的怪事很多，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是其中一事。按理说，学习领袖的著作，本无可非议，但被林彪“四人帮”扭曲的荒唐可笑，也就有悖于常理了。

近来整理旧的书报杂志，发现有很多《毛泽东选集》，这使我想起了文革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幕闹剧。

这些书籍全都是赠送的，有《毛泽东选集》六套，《毛主席语录》五本，《毛主席诗词》四本，老三篇（即“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三套，《最新指示》两本。这些书有简装的，也有精装的；有大本的，也有小本的；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有很厚的，也有

很薄的；有正式出版社出版的，也有造反派组织自己翻印的。为了加深学习毛主席著作，上级还配发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等马列著作。我想还不止这些，在多次工作调动中一定还遗失一些。然而这么多书根本就无人问津，有的连翻都没翻，就束之高阁，后来当废纸卖了。另外，我还有一包精致的，流光溢彩的毛主席像章。它们是用高质量的铝或塑料制成的，成本很高。想想我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都有这么多的赠品，全国各界人士加在一起该有多少啊！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浪费！再加上打，砸，抢，光革命不生产，荒唐不经长达十年，国民经济怎么能不滑到崩溃的边缘？

这些免费赠送的书籍不是一次发给的，它是随着革命的不断高涨而多次发给的。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反革命集团就别有用心的开始“造神”运动，先是让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后又大张旗鼓的宣传全国向解放军学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是最大的天才，毛主席的语句是真理，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书是百科全书等等，不一而足。此类肉麻的话充斥各种报刊和广播，成了不是运动的运动，给各级党委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为了跟上形势，校方就组织了一次大型《毛选》赠送大会。校党委书记作了大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报告，师生代表作了积极的表态，然后每人发给一套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同时伴随着鞭炮声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一时间煞是热闹，轰轰烈烈。这是第一次大赠送。

记得后来成立红卫兵组织发一次，造反派派战斗队发一次，工宣队进驻发一次，军管会发一次，最后一次是毕业后到部队军垦农场劳动锻炼。那时解放军是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榜样，自然我们一到部队给我们的欢迎礼物就是毛主席的书。这在当时是一种政治时尚，最有用的东西是毛泽东思想，最珍贵的礼物是毛泽东的书。有一时期安徽省某地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中央问安徽省领导要不要物资援助，省军管会的负责人说：“我们不要经济支援，我们只要毛泽东思想。”结果这话大受中央的表扬，被认为是思想觉悟先进，认识水平高，值得全国学习。当时部队全团集合，仪式隆重，我们每个学生被赠送一套崭新的四卷《毛泽东选集》。这种热烈的欢迎实际上掩盖着一个真相。学生在校时已经毕业一年多，国家硬是不分配工作，也不发工资，毕业生非常急噪，有的回家，有的逛街；有的吹拉乐器，有的谈情说爱；整天无所事事，无聊至极。时称为“逍遥派”，实则是心里苦闷。到军垦农场劳动，美其名曰：接受解放军再教育，实则是怕学生在城里闲着无聊闹事。所以并未解决思想问题，学毛选也只是做做表面文章。

学毛选的声势可谓浩大，上至中央领导（除毛主席一人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学。干部开会前，工人上班前先要学习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开始开会或工作。谁违反了就是大逆不道，犯政治错误，就有被撤职批斗的危险。不仅白天学，晚上还要学。有的夫妻是双职工，晚上要到单位去学习，孩子生病发烧，也不敢请假在家看护。还有的饿小孩因无人照管，跌破头割烂手的故事也时有发生。

不仅城里的干部，工人学生要学，农村里的贫下中农也要学。他们不识字，就由识字的生产队长或会计带着社员学，队长念一句，社员跟着重复一句，也不知什么意思。有一次我回家，清晨还在睡梦之中，就听人用铁皮卷的广播筒大喊：“白求恩，加拿大人……”，我就问哥哥：“这是干什么？”哥哥说：“这是生产队长读毛选，让社员听。”生产队长天天这样喊，吵的大家睡不好觉。更加严重的是，有时为了强调学习而耽误了生产，损失了粮食。就这样的形式主义，宣传部门还用文艺的形式赞扬贫下中农的学习。当时我省一对男女同学，正在谈恋爱，两个人都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们的节目除了“哒哒哒”的跺脚声，就是一个《老俩口学毛选》的表演唱。男的嘴上贴着胡子，女的头顶一条毛巾，很象一对老头老太。他们俩演的很带劲，不仅在学校演，而且到外地演，农村演。其实六七十岁的贫下中农根本不识字，哪里读的懂毛主席的著作呢？大家看了只觉得滑稽可笑，并未受到什么思想感染。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毛主席经常发出新的指示，学习的内容转向最高指示。造反派指挥部有几个人专门负责收听中央广播。每当听到毛主席的新指示，不管什么时候，哪怕是深更半夜，也要用高音喇叭大声广播。这时大家都要马上起床，在操场上集体学习一遍，然后敲锣打鼓的上街上宣传。有时有些狂热分子因激动而叫错口号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扭送牛棚的也不乏其例。有很长一段时间，造反派无事可干，就靠这过日子。到了文革后期，为了斗私批修，提倡重点学习“毛三篇”，说是学好“老三篇”，就能改造好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为了推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各级党委使出了浑身解数。从公社，县，地区直到省，全国，分别评选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召开大会，予以表彰，并让学习积极分子到处作报告，宣传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这些人是发展党员的首选对象，然后招工提干，从此端上了铁饭碗。很多年轻人把这看成是政治投机的捷径，于是纷纷表演，作秀，看谁的花样翻新。在部队时，有的人白天不看书，专等夜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毛主席语录，连长，指导员一发现就大加表扬。还有些人生病去医院，也捧着毛主席著作看，我对此稍有微词，指导员还白了我一眼。其实，我早在一九六三年底就通读了毛选四卷。当时我觉得，学习伟人著作，主要是学习他的思想，观点，方法，不在于他的一些词句。但我的想法不为当时的形式所容，只能埋在心里。

后来，不知谁想出一个“馊主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尽管荒唐的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只要有一人提出，谁也不敢反对，否则，就是不忠于领袖，是政治问题。所以，很快就把这种荒唐发展到全省，全国。当时有一份小报道，赞扬一个人跳忠字舞，从合肥的大西门一直跳到东区的火车站，距离还有近二十里长，真是创造了世界之最。当时若有吉尼斯记录，一定能够入选，我们在部队农场更加典型。当时农场的条件很差，房子是在洼地上用泥巴筑起的墙壁，床铺是搭在泥坯上的木板，十分拥挤，行走都很困难。早晨起床号一吹，大家就迅速起床，挤在过道上，对着毛主席像，由排长先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然后大家一起背诵一段语录，俨然庙宇里的念经，教堂里的祷告。晚上再对着毛主席像汇报。每天三顿饭前还要跳“忠字舞”，唱的歌曲是一首当时家喻户晓的藏族民歌，歌词是：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  
……

每个人手里拿着红宝书（红皮的毛主席语录），边唱边跳，哪怕是冬天寒风刺骨，夏季烈日炎炎，都要跳完才能吃饭。我们连队还有一个滑稽的镜头，司务长又高又胖，动作笨拙，又是个瘸腿，跳起来一歪一歪的，十分好笑。但我们都咬紧牙关，不敢笑出声来，否则又是政治问题，上纲上线，叫你吃不了。还有一次，欢迎北京七机部来农场锻炼，会上我们和他们一起跳起了忠字舞，全团几千人，场面很是热烈壮观。当时我在想，这是不是全国人神经不正常，象疯子一样？这种局面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文化大革命不堪回首，林彪，四人帮都倒行逆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我们决不能让这段荒唐的历史重演，愿我们国家沿着科学民主的道路早日走在世界的前列。

~~~~~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二十一）

• 舒 云 •

102、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林彪讲话，毛泽东事先知道吗？

毛泽东主持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问谁讲话？林彪说他想讲几句。毛泽东说好，请林彪同志讲话。1970年8月，毛泽东南巡谈到九届二中全会，说林彪那个讲话，事先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有打。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慌手脚。

事情真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吗？完全不是。

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汪东兴悄悄从毛办把张春桥当总理的文件拿给陈伯达看。

这是故意挑起矛盾呢？还是激将法呢？

林彪在台上讲话时，叶群在台下对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101（林彪）在讲话前请示了毛主席。确实，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毛泽东和林彪关上门说了半小时还多，以至推迟了45分钟开会。叶群在门口“警卫”，防止江青闯进去。因为林彪在抨击张春桥。林彪问过毛泽东，可不可以讲（张春桥）？毛泽东说，可以讲，但不要点名。这些话，叶群通报了黄吴李邱和陈伯达，她对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说，要在各组表态拥护林彪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的观点。但发言千万不能点张春桥、康生的名，更不可触动江青。陈伯达当面问过林彪，是不是这回事。林彪承认是有这回事。

林彪讲话很少让人写稿子，他自己写。想几天，今天想一条，明天想一条，没成句的话，两个字一行，三个字一行。一张纸上写两三个字，啪丢在地上。他体系形成，叫秘书整理整理，就够了。别人不用，就叫于运深，怕别人来得慢，在林办干得最长的秘书就是于运深，一般一两年就走了。弄讲话，前一个钟头讲，叫于秘书来。于秘书写一行，再看一张纸，又是一个观点。不要编句子，要原话，林彪脑子好使，拿稿子就讲。林办秘书于运深说：林彪要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让准备一个稿，搜集北京突出政治有些什么效果，还强调要发展经济，林彪没有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办秘书宋德金说：林彪让准备五个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德、日由弱变强的资料。

自从吴法宪汇报张春桥的反毛言论后，林彪决定抨击他。但是，抨击张春桥，这不是个一般的问题，会不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说：在庐山开会前讲不讲那番话，林彪曾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见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说，要讲。九届二中全会后，林立果打电话给林办秘书张云生，骂叶群瞎指挥。

林彪在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这个宪法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30条中间，最重要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林彪还提到，“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林彪还说，“说毛主席的学说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深思，尤其是在中央工作的同志深思。”

党史专家于南说：林彪的这段话明显地是对着江青集团的，因为康生反对学习“老三篇”，康生、张春桥不同意在宪法上写“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因为有“二月逆流”的前车之鉴，林彪批判的矛头只能围绕要不要“三个副词”、要不要“天才”、要不要“国家主席”这些表面文章上。这“三个副词”最早见于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1966年12月16日，由林彪署名实际上是张春桥起草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照抄。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毛泽东两次提出删去《党章》草案中出现的“三个副词”。有人说这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毛泽东说，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都没有写上这“三个副词”。不知为什么，林彪，甚至周恩来都没有注意到？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出台后，周恩来从北京调毛泽东在《党章》上批示来看。毛泽东南巡时说，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来看看？康生、张春桥等明知毛泽东不让写，写上也会被圈掉，但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吴法宪攻击他们时，就是不明说。故意到庐山会议上说，不是我们不写，是毛主席不让写。

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委员和各大组召集人会议，吴法宪提出播放林彪讲话的录音，会议一致通过。第二天用了一天的时间，上午开大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播放了两遍。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下午讨论。在播放录音时，有人提出要印发，到会者鼓掌通过。周恩来让汪东兴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对汪东兴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毛泽东还嘱咐要由林彪审定后发。这个印发稿，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林彪没有稿子，是即兴，都是“吹”毛泽东。毛泽东也在现场，他并没有当场反对，怎么会有“反革命”的味道呢？

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说宪法写上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是经过严重斗争的，现在竟有人胡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这是想搞历史翻案，这种否定天才的人是历史的蠢才等。8月25日上午，华北组六号简报发到各组，坚持设国家主席、叫嚷揪人的呼声更高更急，几乎成了一边倒。有的组通过决议，宪法草案一定要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定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200多位中央委员全对准张春桥，“千刀万剐”之声不绝。把江青、张春桥等人吓坏了。江青率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那里告状，又哭又闹。毛泽东认为这不是反张春桥的问题，与“二月逆流”一样，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对毛泽东，反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他们名义上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所以毛泽东突然变脸，下午，他主持各大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发言违背九大方针，强调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毛泽东说，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死。你们再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会议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六号简报。

8月26日、27日休会，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批评了他们，要吴法宪检讨，并将吴法宪手中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天才的几段语录》转给毛泽东。毛泽东找了一些人谈话后，8月31日写了700多字的《我的一点意见》，给陈伯达定了性，说他搞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9月1日，各大组学习《我的一点意见》，开展对陈伯达、吴法宪的批判。9月6日闭幕式上，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后，毛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非常措施，并在全党开始了批陈整风运动……

看来，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九一三事件。而这一切，是从得到毛泽东同意的林彪讲话开始的。

1 0 3、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为什么不写检讨？

有材料说林彪下庐山后，坚决不写检查，是这样吗？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说，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曾写过检查，是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送上去没有，不知道。王焕礼也承认他帮林彪写过检查之类，但是不是检查林彪并没有说，也没有让他送。

毛泽东南巡时说：他们心里有鬼，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林彪当然要负责任……林彪犯的错误，全军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他应当做检讨，我已经向政治局建议。

这就是说，毛泽东没见到林彪的检讨。他不会放过林彪，他一定要林彪检讨。也就是说，一定要让林彪屈服。毛泽东喜欢别人检讨，这些检讨抓在手里，就是小辫子，既能让检讨者夹着“尾巴”，又能从检讨者的字里行间抓出把柄，有利于再打倒。

刘少奇、邓小平等等被打倒的大人物都一再检讨，希望老人家宽恕。当然，毛泽东放过他心里是有谱的，刘少奇是要让他死的，而邓小平一开始打倒“待遇”就不同，汪东兴安排邓小平一家搬到江西南昌一所军校的将军楼里，禁闭了一段，又让邓小平到附近的工厂劳动。单独关押其实是最重的刑罚，人是群居动物，需要与人交流，而单独关押几年十几年后，人就不会说话了，而且往往会出现严重的精神病。如此看来，毛泽东对邓小平只能是“冷藏”，需要时会将他从“冰箱”里拿出来。

林彪深知此道，他至死没有检讨。

林彪为什么不检讨？我们从林彪的角度考虑，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有什么可检讨的？林彪晚年虽然当上了毛泽东的接班人，上了《党章》，但是林彪没有一点点权，调动一个班的兵力也要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林彪知道，毛泽东最怕他手下的接班人夺权，所以所有送到林彪办公室的文件，林彪都不表态，送毛泽东，或送周恩来，他乐得当甩手掌柜。如此说来，林彪不管事怎么可能犯错误？而且林彪深知毛泽东的禁忌，最怕别人结帮，所以林彪从不与人来往，生怕毛泽东怀疑他拉帮结派。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的讲话句句吹毛，称天才，是称毛泽东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是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怎么就成了反党纲领？怎么就成了篡党夺权？

林彪没有认为自己有错。既然没有错，写什么检讨？起初，林彪还想找毛泽东解释，却几次碰了钉子，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只要林彪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根本不见。1971年五一劳动节，林彪已经没有了见毛泽东的心，他本来不想去天安门。经周恩来做工作，林彪勉强上了天安门城楼，坐在毛泽东对面，中间隔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些果品和饮料。但是毛泽东视林彪于不见，故意与身边的西哈努克有说有笑。林彪低头坐了几分钟，悄悄地走了。此时林彪已经彻底明白，毛泽东是要卸磨杀驴了。但林彪采取任何措施，坐在屋子里等死。

1 0 4、是谁制造了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

1969年3月3日，中共“九大”之前，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该收尾了，他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九大”文件上中央文革不要加了，（它）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康生主持“九大”《党章》草案时，写上了“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审阅时改为“设立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确定“九大”以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

这样，江青等人虽然如愿进入“九大”的中央政治局，但他们在中央政府和军队里却没有职务。江青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是个闲人。而林彪不仅是军委副主席，而且成了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加上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在毛泽东眼中，林彪掌握了军队大权，目前又太“红”，而且没有了压制他的对手，会疯狂冒尖，这是很危险的。

一直怂恿林彪吹毛泽东的毛泽东要降温了。这时刘少奇已经成“死老虎”，不再需要个人崇拜了。

早在1968年9月，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世界人民胜利的航向》一稿时，删掉了绝大部分的毛泽东思想的词句，还删掉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同时，毛泽东写了一句话：“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1969年5月31日，毛泽东到武汉，住了将近一个月。刚到梅岭一号，毛泽东就要工作人员把四周挂的毛像和毛语录统统摘下来，一个不留。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话，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其实，林彪说的一句顶一万句，是文学中的夸张，就像李白的“白发三千丈”一样，为什么硬要把它变成科学的语言呢？

而毛泽东甚至更加明确地说：四个伟大，太讨厌！

毛泽东看“九大”纪录片，半截愤然退场，说哪有一个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有什么意思！

6月12日，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说今后不经过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的活动”。

1970年4月初，毛泽东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稿，删掉了林彪关于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毛泽东并批了一大段话：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反感的東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林彪看后没有表态。

在打压林彪的同时，毛泽东扶植林彪的反对派，因为他需要平衡。

“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名正言顺，江青等一伙“文革”功臣也该“告老还乡”了，否则，会功高盖主。这是毛泽东没有给江青等人实职的原因。“九大”削弱了王张江姚的势力，扶植谁成为林彪的对手呢？周恩来？周恩来一向做实际工作，又跟林彪关系不错，他不可能成为

林彪对头。还有谁呢？制约林彪，还得起用王张江姚中的一个。江青冲冲杀杀可以，弄不了理论，王洪文太嫩，姚文元是个书呆子，只有张春桥能拿上台面。

4月初，毛泽东专门到苏州看望林彪。毛泽东明明知道林彪看不起张春桥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小记者”，但故意在见林彪时带上张春桥，甚至对林彪说准备让张春桥当总理。其实毛泽东从来都没有让张春桥当总理的意思，可张春桥并不知道这是张空头支票，于是有了冲锋陷阵的动力。

7月27日，中央政治局审查两报一刊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稿，陈伯达和张春桥发生争执。张春桥坚持社论稿中的新说法：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陈伯达主张用老说法，去掉“毛主席和”四个字。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说：这件事要请示主席。周恩来到上海陪毛泽东会见外宾，当面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似乎并不在意，说这一类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毛泽东让汪东兴代他圈去“毛主席和”。7月30日，周恩来写信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可是，毛泽东并不是不在意，而是非常在意，一年多后，毛泽东南巡，多次说：他们争论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

8月13日，因修改宪法，吴法宪与张春桥又起了冲突。吴法宪哪里知道张春桥背后有毛泽东撑腰，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

这样，所谓的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冲突加剧。

上了庐山，林彪在毛泽东支持下，向张春桥开炮，得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虽然林彪没有点名，但江青集团惊慌失措。而毛泽东坚持支持了江青集团，打倒了陈伯达，黄吴叶李邱频频检讨。痛打落水狗的毛泽东决不放过林彪，他一路南巡，矛头直指林彪。

105、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从什么时候开始？

应该说，林彪早就把毛泽东看透了。早在1958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后，就曾在笔记本上斥责毛泽东“凭空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看来，林彪不是不了解大跃进等三面红旗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林彪又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热捧毛泽东？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林彪骨子里同意刘少奇等人的做法，但在表面上还维持着为毛泽东大唱赞歌。到“九大”前，毛林矛盾开始显露出来。

毛泽东让林彪和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林彪不同意毛泽东的那一套，赞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针对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林彪提出“民富国强”，要林立果搜集资料。周宇驰把这个情况对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说了，王飞说好，真像政党的样子，没钱富不起来，自力更生当然对，可资金原始积累困难。1970年八一前夕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

非常奇怪的是，九一三事件前，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印刷几百万几千万册。当时吴法宪虽然下令收回一小部分，但仍然有大批的“白皮书”流传民间。但是，九一三事件后，“白皮书”一本也不见了。但是，林立果的这本小册子并没有批判。如果像《五七一工程纪要》一样，被公开全文批判，我们就可以知道里面的内容。但是，直到今日，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仍无影无踪。

那么只能解释为，里面没有被批判的内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提到我们搞社会主义，主要是搞政治，也搞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建立在现代经济的基础上。这是林彪的一贯思想，林彪在“七大”发言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解释，首先说共产党的名字，中间有个“产”，就是说，共产党就是要搞生产。林彪说：“我们谈政治谈党，首先就是经济问题。我们是拿“产”字作旗帜。我们有的同志实际上不注意“产”，忘了本。共产党不注意“产”，那就大大不合格。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做什么呢？是要“产”，不是私产是公产。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所以要革命。”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支持陈伯达强调“促生产”。而毛泽东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七、八年再来一次。所以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报告连看也不看，另由张春桥重起炉灶，林彪念的是张春桥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叶群让秘书勾出重点，哪里要拉长声，哪里要念慢一点，而林彪事先连一眼也没看，念得结结巴巴。

虽然林彪在“九大”被毛泽东确定为他的接班人，并被写进《党章》。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却越来越多，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包括打倒那么多的老干部，包括设国家主席，到九届二中全会分歧达到高潮。

（续完）

□ 选自 舒云_新浪博客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